

March 2019

On the Possibilities,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s of Trauma Narratives

Weihua He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He, Weihua. 2019. "On the Possibilities,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s of Trauma Narrative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9, (2): pp.170-17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2/1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创伤叙事的可能、建构性和功用

何卫华

摘要: 创伤事件留下的各种“踪迹”使得创伤叙事成为可能,此类叙事的功用不仅在于其具有强大的疗治性功能,更在于其能够烛照通往历史现场之曲径。近年来,创伤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个体性创伤及其修复,而开始更多地聚焦于集体创伤。一旦集体创伤在某种文化中得到确认,不仅会影响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同时还会影响共同体的塑造、维护和巩固。由于蕴藏于其中的巨大能量,集体创伤的表征因此必然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众多的权力关系都会参与其中。在剖析这一建构性的过程中,各种“他者”遭受的创伤开始显影,创伤研究由此成为批判殖民主义、父权制、战争、偏见和各种不合理制度安排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创伤叙事; 再现; 建构性; 他者; 伦理

作者简介: 何卫华,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语文研究》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文化研究和流散文学。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政编码:430079。电子邮箱:whua_he@163.com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前沿文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B087],同时得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CNU19TD016]。

Title: On the Possibilities,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s of Trauma Narratives

Abstract: Trauma narratives are made possible by the “traces” left by traumatic events. These narratives are not only therapeutic, but can also provide an access to historical reality. In recent years, critics begin to switch their attention from individual traumas to collective traumas. According to them, collective traumas not only affect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mmunity, but als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ormation, maintena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community. Due to the shaping influence of collective traumas, different forms of power are woven in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trauma, mak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trauma a produc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the traumas witnessed by “others” have now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ritics, thus making the critique of colonialism, patriarchy, war, prejudices and unjust social mechanisms an important task of trauma study whose ethical dimension is also demonstrated.

Keywords: trauma narratives; representation; construction; the Other; ethics

Author: He Weihua, Ph. D.,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also the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His main academic interests ar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ultural studies and diaspora literature. Address: No. 152, Luoyu Road, Hongshan District, Wuhan, Hubei Province 430079, China. Email: whua_he@163.com. Funding: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14ZDB087) and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CCNU19TD016).

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领域涌起一股“创伤转向”的浪潮,其热度至今一直有增无减。林林总总的各类创伤书写,将批评的重心再次移回主体、历史和现实,强力回击了虚无主义思潮在理论界的蔓延。正如大家所知,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异军突起,“人之死”“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危机”和“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等时髦的论调在中国理论界炙手可热,主体、历史和各种本质性事物不断被消解,紧迫的现实问题则被悬置、边缘化或被有意地置换为“无关痛痒的”学术话题,批评应有的社会功能遭到削弱,创伤理论则成为对抗此类理论风气的重要力量。在当下社会,疾病、车祸、性暴力、抢夺、谋杀和矿难等事件都会引发创伤,导致个体身份认同的崩塌;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种变革风起云涌,在这一社会进程中,环境污染导致的灾难、大量人口的流离失所以及国家间的冲突等重大事件,都会使相关人群遭受冲击,受到伤害,严重时则会演变为内心的创伤。^①更重要的是,借助现代化传播手段,创伤性事件哪怕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都能被迅捷地传送到个体的视听范围之内,宛若近在咫尺,更多悲剧性事件因此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关注。对此,杰弗里·哈特曼总结说,创伤已经不再局限于大屠杀和种族清洗等令人发指的惨剧,在当代,无论灾难发生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借助发达的媒体快速传播,从而带给人们更多的创伤性体验(Hartman 258)。在社会传播系统和教育水平比较落后的时代,只有达官显贵的不幸遭遇才可能被建构为具有纪念和传播意义的创伤,并沉淀为集体记忆;但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横空出世,创伤不再是“特权”,贩夫走卒生活中的创伤性事件同样可以被建构为公共事件,成为焦点。在大转型时代,创伤性事件急剧增加,再加上大众媒体对相关事件的快速传播,使得创伤体验成为现代人的日常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当下文化已整个地“浸染在创伤之中”(Visser, “Trauma Theory” 271)。内在于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大变革,无论对不幸卷入相关事件的亲历者而言,还是对从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媒体上知晓这些事件的人而言,都是潜在的创伤体验。在个体层面,创伤会对个体的认知、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产生负面影响,使个体无

法正常生活;在集体层面,创伤则会波及整个群体,加固、破坏或颠覆共同体。

一、创伤、见证与表征的可能

“创伤”(trauma)最初主要指外在力量在身体上造成的物理性伤害,但经由夏科、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阐发,该词现在更多是被用来指精神性伤害。19世纪60年代,由于火车惊吓症的出现,人们开始更清楚地认识到创伤的存在,在这之后,女性歇斯底里症以及炮弹冲击症(shell shock)同样被纳入到这一范畴中。然而,直到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颁布《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被正式收入词条,至此,创伤才被正式确认为一种疾病。导致创伤的可以是战争、灾难和暴力等重大事件,但生活中的变故、惊吓、疾病、挫折、亲人的故去,甚至被动物攻击等日常事件同样会带给个体创伤性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说的就是此类心理障碍,过去的不愉快经历造成的影响则是其根源。作为疾病,创伤古已有之,历史上的记载亦不鲜见,但在此之前,受害者表现出来的症状往往被认为是某种生理性缺陷。在战场上,战士一旦表现出创伤症状,他们并不会被视为受到伤害的病患,而会被当作贪生怕死的懦夫,受到责罚,被认为是有意找借口,逃避战斗。^②因此,创伤正式被确认为一种疾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创伤患者由此开始得到应有的关注,获得必要的治疗。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开始意识到创伤在社会中的普遍性,其受害者并非局限于亲历者,还可能是间接同悲剧性事件发生关联的人。就此而言,一个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应是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她精神崩溃,最后自杀身亡,这和她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受到的冲击不无关系。

虽然创伤研究者众多,但弗洛伊德无疑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在他看来,作为一种痛苦的经历,在个体的心理结构中,创伤往往遭到压制,因此主要停留于无意识之中,如果不进行疏导,并将其很好地整合到个体的认知框架之中,就会以梦魇等形式间歇性地表现出来。为说明伤害的重复性特征,弗洛伊德借用过浪漫史诗《自由的耶路撒冷》中的故事。^③故事中,由于无心之失,坦克雷德杀

死了恋人克洛琳达,在埋葬女友后,悲痛欲绝的主人公来到一片树林,并挥剑砍倒了一棵树,却发现恋人的灵魂恰好被囚禁在这棵树中,从而再次伤害了她(Freud 16)。对于遭受创伤的个体而言,创伤的回归并造成伤害同样具有不可把控性;无论愿意与否,创伤的客体都遭到牢牢把控,像克洛琳达一样,将会再次受到伤害。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暴力性事件一旦发生,并对个体产生重大影响时,创伤也就得以形成。这种暴力性事件既可能是伤害到了受害者的身体,亦有可能是对其心理、情绪或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受害者而言,由于冲击力过大,在发生时,创伤性事件并没有得到完整而明晰的理解,其回归会表现出一定的延迟性(belatedness),先在受害者大脑中潜伏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期(latency),才开始不时回归,这种重复性被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称为“复演”(acting out),^④这种侵入不受个体控制,总是隐伏于个体内心的某一角落,伺机归来,并对个体造成难以抹除的消极影响,扰乱或颠覆其既往对自我和外在世界的认知,冲垮个体认知和身份认同系统的堤坝,最终精神崩溃。

哈特曼指出,相互矛盾的两种因素构成了创伤的内核:没有被认知或意识到的创伤性事件,以及对该事件的记忆(Hartman 537)。对于创伤的这种悖论性,其他理论家亦有提及。凯西·卡鲁斯总结说,“总体上来讲,创伤是对意料之外的或过于强大的暴力事件的回应,或者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无法得到完全把控,但在此之后,却通过重复性的回放、梦魇或其他形式的重复性现象而不断地回归。”(Caruth 91)在该定义中,卡鲁斯强调的是创伤性事件的无法把控性、重复性和回归方式。类似的特征,格雷格·佛特同样进行过论述,他指出,创伤是“过于强大的事件,并且不能被同化,以至于自我只能通过从对该事件的直接体验之中缺场进行回应。于是,创伤(在主体中)只能存在于自我‘不在场’的缝隙之中。由此,其会不由自主地迸发到意识中,但形式并非是可以讲述的故事,而是以侵入的、滞后的经验和非时间性的记忆碎片的形式(闪回、梦魇、图像踪迹等)出现,只要它们没有被扬弃为传统的线性叙述形式,它们就是‘忠实于’创伤性事件的”(Forster 71)。佛特的定义强调了感知主体的缺场性,但

同样强调了创伤的不可把控性、重复性和反线性叙事等特征。无论哪种定义,都无法忽略内在于创伤的这种悖论性:一方面,由于其突发性、强力性和无法把控性,造成受害者在事件发生时无法对其形成整体的、清晰的和全面的把控,因此,创伤性事件在记忆中往往是零碎的、不成章法的和无法完全还原的;但在另一方面,创伤的受害者和研究者却一直在为重构创伤性事件苦心孤诣,对“不可言说”进行言说,如同古代的炼金术士,他们在“复演”中寻丹觅药,拼贴残片,让影影绰绰的事件逐渐厚实和丰满,渐现真容。

就创伤的疗治而言,还原创伤性事件始终是中心任务。在精神分析学家们看来,该任务的终极指向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修复,因为“幸存者不仅需要幸存下来以便能够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了存活下去,他们同样需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每位幸存者身上,都存在着讲述的迫切需要,从而能够了解自己的故事,而不为过去的鬼魅阻碍,个体必须保护自身不受其伤害。一个人如果要能够继续生存,就必须了解自己被掩埋的真相”(Felman and Laub 78)。在疗治中,为了实现对创伤性事件的再现,精神分析师的常用手法是谈话疗法。在谈话、问询和讲述过程中,散落的“碎片”各归其位,经过不断重新整合,被压制的创伤性事件开始浮出水面,其本来面目逐渐丰满,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能够被个体认知、阐释和把控,进而被整合到个体的精神架构之中,成为其有机部分。但由于其“无法把控的”特性,面对该任务,通常意义上的记忆或意识往往束手无策,因此必须寄希望于“复演”,曲径通幽,正如凯西·卡鲁斯所言:“仅仅在个体过去的暴力或者原初事件中,创伤并不能得到确认,而只是在这之后,其无法同化的本质——其最开始它没有得到完全认识的方式——返回并不断地缠绕着幸存者的方式之中,创伤才能够得以认识。”(Caruth 4)一开始,创伤始终是以缺场的方式而存在,就其逻辑而言,这有些类似于詹姆斯意义上的缺场的“历史”,永远无法完全抵达。为了通达创伤患者的内心世界,获取或去接近创伤性事件的“真实”,由于受害者的有意记忆并不可靠,因此,精神分析师只能借助于催眠、谈话、梦境或其他心理疗法。

“还原”创伤性事件,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除了精神分析,叙事具有同样的功能。关于

叙事的疗治性效果,多丽·劳伯强调说,对创伤患者而言,疗治性过程就是“建构一种叙述的过程,就是重构一段历史,从根本上来讲,也就是事件的外在化过程(Felman and Laub 69)。类似于精神分析师们的“谈话”,以叙事的方式重构创伤性事件,创伤的受害者重新体验之前的事件,由此将创伤整合到自身之中,将其吸纳为个人性思想星空的有机部分,从而扫除阴霾。但在表现创伤叙事时,常规叙事模式往往力不从心,因为“创伤性事件,尽管切实存在,但却发生在‘常规的’现实之外,因果关系、先后次序、地点和事件都无从谈起。因此,就创伤而言,这里没有开端、没有结尾、没有清晰的过程,一切都在一片混乱中。无法用既有的范畴来对其进行确认,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者性’、凸显性(salience)、永恒性和无所不在性于是成为其特质,这使其超越了可通过联想而关联起来的范围,同样在可被理解、重述和把控的领域之外”(69)。正是由于创伤性事件的独特性,创伤叙事注定只能是对不可把控事物之把控,在描述这一矛盾时,罗杰·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一语中的,他指出,“就其震惊性影响而言,创伤是反叙述的,但其同样生成对回顾性叙述的疯狂生产,寻求对创伤进行解释”(79)。在创伤记忆中,事件往往是时空倒错的、碎片式的和无逻辑的,无法直接和全面地把控,要有效地表征创伤,文学作品就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在人物、语言、风格、叙述和情节安排上进行调整,探索和尝试全新的文本形式和叙述策略。

因此,在经典创伤文学作品中,作者在形式上的匠心独运并不鲜见。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她的《宠儿》这部作品中,为了让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不再遭受黑奴的悲惨命运,逃跑过程中,塞丝杀死了亲生的骨肉。在这之后的生活中,杀婴这一行为如同梦魇般缠绕着塞丝,谜一般的宠儿的到来同样可以被视为这一悲剧性事件的“复演”,借助于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等手法,《宠儿》生动地演绎了遭受创伤者思维特有的重复性、碎片性和非逻辑性。在布克奖获得者帕特·巴克(Pat Barker)的《重生三部曲》中,通过插入鬼怪故事的形式,死者魂灵不断地入侵和破坏生者的现实生活,从而加深生还者内心的愧疚感,让他们饱受折磨和煎熬。^⑤为了让读者对梦魇般的创伤经历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诗人们

同样在不断探索各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在纳粹统治期间,出生于1920年的犹太诗人保罗·策兰不仅历经种种磨难,还见证了父母在集中营中的惨死。作为见证文学的最杰出代表之一,策兰将苦难化为沉甸甸的诗行。在《死亡赋格》(“Deathfugue”)一诗中,其中的“重复,代表着存在于所有创伤性经历中的复演,这一复演经常会产生令人疯狂的效果,拘禁必然会引发一种压抑性情感,这一情感要想得到传达,重复自然就是最合适的工具”(Martínez-Alfaro 191),借助新颖、恰切和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策兰在诗行中注入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感染性力量,再现了充斥于集中营中的压抑、死亡和绝望,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同身受。

二、集体创伤与被建构的共同体

在创伤事件中,遗落有历史的“踪迹”,但好似碎裂的花瓶,要复现其风姿,必须重新拼贴散落一地的碎片。在凯西·卡鲁斯这里,创伤被视为历史的“症候”,在她看来,“如果创伤后应激障碍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病症性症候,那么与其说它是无意识的症候,不如说是历史的症候。也许可以这样讲,遭受创伤者的内部承载着某种不可能的历史,或者说他们自身已成为历史的症候,而这一历史是无法完全被他们自己把控的”(Caruth 5)。重构创伤性事件因此具有双重使命,在帮助个体回到正轨的同时,还将凿开进入历史的通道,烛照无法被直接认知的历史层面。凯西还强调:“当事件发生时没有得到完全认知,正是在此意义上,它才具有指称性意义,历史成为创伤的历史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换言之,正是在其(创伤)发生时的具体情形的无法接近性之中,历史才能够被把握。”(18)通过描述悲剧性事件在个体或集体层面造成的丧失、不安和恐惧,个体性创伤最终将同宏观的社会现实相关联。以创伤为突破口,去接近大屠杀、越战和性暴力等,去穿透无法言说的个体性和集体性悲剧事件,在抚平昔日创伤的同时,还可以还原历史现场,由此去诊断历史和时下的病症。

在创伤研究的“文化转向”后,将个体性创伤同宏观历史和社会勾连已成为重要议题。就精神分析学家们而言,个体的心理层面是他们关注的

重心,个体对暴力性事件造成的冲击的回应或无法回应是其分析的重点。在他们看来,强大的外力对个体的身份意识具有摧毁性影响,使个体意识或精神错乱,导致个体的心理创伤。“文化转向”之后,创伤理论着力更多的是集体层面的创伤,一旦特定文化、共同体和社会遭遇创伤,其负面性后果影响到的群体更大,影响更广泛、深远和具有持续性。对集体创伤而言,聚焦创伤事件本身,终极指向往往是其建构性、政治意图和背后盘根错节的权力操控。就特定悲剧性事件而言,能否被表征为集体创伤,该过程不同于花开花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合力。大千世界,自然灾害、意外事件和人为灾难层出不穷,要想在一种文化中被表征为创伤,需要经过确认、筛选和合法化;当然,“去芜存菁”的背后,不过是多种力量间的相互冲突、较量和妥协。各种力量的碰撞,在决定悲剧性事件能否被建构为创伤的同时,还对创伤的阐释方式、意义范围和社会功用进行了限定。由此可见,创伤的建构是多种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每一种力量都试图将其纳入自身议程中。因此,究其根本,集体创伤是文化的建构,而创伤研究的“文化转向”就是要显影集体创伤的形成机制、社会意图和政治性。

在此类操作中,集体创伤和共同体间的关系是关键。共同体的塑造不仅受制于具体的历史情景,还涉及到众多力量的参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语言的发展,人们才逐渐形成对共同体的重新想象,并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⑥事实上,共同的语言、地域和利益追求等客观因素固然重要,但就共同体的形成而言,亦不可忽略共同的认知、价值观和理想等主观因素,二者相互协作,决定着共同体的现实形态。因此,共同体是建构的结果,但由于其构成要素变动不居,个体对共同体的认知、想象和认同会不断调整、修正和重构。在这众多因素中,记忆的作用非同一般,而由于其强大的冲击力、激烈程度和持久性,创伤记忆更是不容小觑。关于创伤记忆同权力、身份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珍妮·埃德金斯强调说,“在我们自身被生产为人的过程中,以及在类似于现代国家之类的权力体系的维持和再生产过程中,记忆和创伤都发挥着作用。”(Edkins 59)这一机制在犹太人共同体的形成中最为明显,“大屠

杀”这一经历已成为犹太人的集体记忆,参与和影响他们的身份建构。当犹太人主张权利时,“大屠杀”总会被再三提及。同样,对非裔美国人而言,奴隶制已成为他们共同的创伤记忆,在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吉恩·图玛(Jean Toomer)、查理德·莱特(Richard Wright)、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爱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和托妮·莫里森等作家的作品中,此类记忆的“复演”屡见不鲜,这不仅是黑人权利运动不干涸的力量之源,同样是美洲黑人集体身份中的凝聚性力量。在中国,自晚清以来,国人对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等悲剧性事件的记忆刻骨铭心,这些同样沉淀为国人身份建构中的重要因素,激励国人奋发图强。不难看出,对集体、社会或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言,创伤记忆始终内在于共同体建构的历史性进程之中。

创伤和共同体的关联并非天然生成,亦非本质性的,自然不会一成不变,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会不断重新调配、结构和组合。杰弗里·亚历山大指出,“‘经历创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过程,用以定义对集体性的痛苦的伤害,确立受害者、责任的归咎、分配理想的和物质性的后果。只有创伤经过如此的经历,如此的想象和表征,集体性身份将会发生变动。”(Alexander 26)在这一意义上,创伤记忆是双刃剑,正如艾琳·维瑟所言,“创伤不仅能够造成分裂,同样可以形成更为强烈的归属感,实际上还能够塑造共同体”。(Visser, “Trauma and Power” 109)换言之,同样的遭遇、记忆和对苦痛的经历,处置失当,对共同体和集体性身份的认同将会带来负面影响,成为破坏、变革,甚至颠覆之前民族身份的突破口,导致共同体的分崩离析;如引导有方,同一事件则可能成为契机,用于塑造、巩固和增强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通常来讲,在共同体内部,当重大的创伤性事件可能成为颠覆性力量时,共同体就会“调兵遣将”,将异质性存在重新编码、统合和再现,直至被整合到共同体的宏大叙事中。如果无法被有效收编,该事件将被压制、边缘化或抹除,当然,抑制其破坏性力量的爆发,将它们从大众记忆中清除,同样需要现实力量的参与。这不仅是指政治权力,同样包括图像、话语、学校、媒体和公共空间等物质性载体,通过选择性地表征、阐释和重复,建构出有利于共同体的集体性创伤记忆。在

此意义上,集体创伤的建构或压制都同权力息息相关,变动不居的权力始终在不停地生成,始终需要修复、维护和加固,而控制表征手段则是其重要方式。集体创伤的建构因此是记忆与遗忘的辩证过程,由于政治需要,一部分悲剧性事件被建构为创伤,其余的事件则被遗忘、被重新定性和阐释。这种建构性就是文化创伤关注的焦点,纯粹的“事件”不会自动演变为集体层面的创伤,而是基于共同体的现实需要,通过调整、修正或重构,特定创伤才会被提升到共同体层面。

由此不难明白,每次创伤研究的热潮,背后都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原因。朱迪斯·赫尔曼就总结说,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系统性创伤研究:第一次出现在19世纪末的法国,当时对歇斯底里症的关注,与当时反对贵族政治和神权政治等历史性事件有紧密联系;第二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和美国,这时的重心是研究炮弹冲击症或战场神经官能症(combat neurosis),而当时反战主义的兴起是其大背景;第三次集中在西欧和北美,这次研究重心是性和家庭暴力,这次的重要推动力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女权运动(赫尔曼5)。由此可见,明确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创伤的确认、建构和表征,每次热潮的兴起,背后都有特定政治、社会和文化力量的推动,以确保特定类型的创伤能够被关注和铭记。总的来讲,创伤的“文化转向”并非要否认各种悲剧性事件的现实性存在,而是要强调事件的多义性特征,这使得阐释上的多元性成为可能,同时为各种权力的施展提供了舞台。经过适当阐释,创伤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例如,任何战争都会对敌我双方战士和民众带去创伤,但在以共同体利益为名而发起的战争中,这往往被忽略,消解于民族荣誉、国家大义或其他形式的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中。在讨论“9·11”事件时,詹尼·埃德金斯就指出说,在“9·11”事件发生后,政府调用各种资源,高调缅怀在这一事件中逝去的生命,借此将其纳入自身的政治议程,以便为将要展开的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论证(Edkins 171)。因此,特定的符码制约着关于“9·11”事件的表征,对此,艾伦·米克指出,在美国,关于“9·11”事件的叙述背后的逻辑是“朋友和敌人、善良和邪恶、西方和东方”之类的二元对立,该事件还被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联系在一起,恐怖分子被视为法西斯,作为无辜的受害者,美国

人发动军事进攻因此天经地义(Meek 179)。无独有偶,在历史上,还有一次“9·11”事件。在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支持下,智利武装部队三军司令和警察首脑发动政变,而时任总统萨尔瓦多·戈森斯(Salvador Gossens)决心誓死保卫智利人民的事业,他率领三十余名总统卫队的战士浴血奋战,最终英勇牺牲。但该事件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因此不为大众熟知。由此可见,悲剧性事件能否最终被确认和建构为集体创伤,受害者能否被聆听,以及对叙事性事件意义的选择性建构和传达,都必须经过确认、合法化和不断强化,受权力监管。

三、记忆的伦理与创伤的表征

在无意识领域运作的记忆,对人的影响更深远和持久。为了更高效地运作,更好地实现自身目的,各种权力都会致力于“记忆”的建构。对民族国家而言,记忆是强化民族身份的重要手段,因此民族国家会不断通过纪念碑、纪念馆和主题公园等物质性载体,强化正面的、可以增强共同体凝聚力的集体记忆,抵制、弱化和消除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上世纪80年代,各种“后”理论和解构理论的风起云涌,带来了理论界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但各种新潮理论泥沙俱下,同样提供了滋生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温床。为“拨乱反正”,理论界重新开始讨论记忆、历史和价值等话题,并出现安德里亚斯·胡逊意义上的“记忆繁荣”(memory boom)。在他看来,“记忆繁荣”源于民族身份问题在当下引发的焦虑,以及少数族裔对自身权力的日益重视等现实社会问题(Huyssen 5)。女性、少数族裔和社会底层出于争取自身权力的需要,要求重构、改写和还原历史,解构和颠覆被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垄断的“真实性”,而这这就要求在既有文化架构中引入新的价值元素和叙述视角,激活被主导性群体忽略、忘却或压制的事物,在此过程中,各式档案、历史资料 and 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任何集体记忆都具有选择性,背后都有深刻的伦理考量。就特定创伤性事件而言,将真相公之于众是缅怀、声援和致敬受害者的方式,是对正义立场的坚守;相反,对创伤性事件的漠视则意味着对丑恶的纵容,是面对不公时对自我责任的放

弃,是对良知的背叛。为推进议程,影响、改变和强化大众对特定事件的态度,在创伤记忆的确立、阐释和传播上,任何利益群体、组织和民族国家都如履薄冰,始终小心翼翼,必须留意创伤记忆的凝聚力、激励功能和对主体的塑造作用,确保其被用于积极的目的。

在互联网时代,“瞬息即逝性”已成为传播的特征,信息传播在加速,但新信息会快速覆盖旧信息;要避免创伤事件湮没在海量的信息中,并使之成为共同的记忆,加强对创伤的表征、分享和传播至关重要。因此,各种力量都在借助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载体去表征创伤,筛选、解释和传播创伤记忆,传递需要的声音、形象和故事,强化有利于自身议程的稳定、持久和有效的“记忆”。

然而,有效的载体是建构、维系和传承创伤记忆的前提,信件、照片、遗物、遗址、雕塑、回忆录、纪念碑、纪念馆和各种形式的影视资料通常会被用来作为载体。相对而言,由于其公共性、持久性和意义的相对明晰性,就对创伤性事件的纪念而言,雕塑、纪念碑和纪念馆之类的载体为大众更为熟知。

战争是典型的创伤性事件,如在一战中,英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大约90万将士战死沙场,由于战争引起的食物短缺和疾病,近30万平民死亡。牺牲不可谓不惨烈,但最终换来了战争的胜利。在英国,为缅怀在各种战争中陨落的生命,据统计,到20世纪末,各式纪念碑已达六万座(Monteith 54)。几乎在英国的每一个小镇和村落,都可以看到此类纪念性建筑物,矗立在一片碧绿草坪的中央,周围点缀有几丛小花,沐浴在英国独有的清风细雨中。在中国,为缅怀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者,政府不仅修建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2014年,还设立了国家公祭日,以法定节日的形式让国人缅怀死难者。在纪念馆中,陈列有大量雕塑、遗物和图片,同时还建有和平公园、胜利广场等,这些照片、历史证言、影像资料、档案以及遗址不断地强化国人对这一创伤性事件的记忆。纪念馆南面有遇难者名单墙,上面刻有一万多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姓名,密密麻麻的名字无疑会给参观者极大冲击。在美国的“9·11”事件中,三千多人遇难,这之中包括三百多位消防员。为了纪念,美国纽约专门修建有“9·11”国家纪念馆,其纪念广场占地八英亩,供世人缅怀死

难者。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德国首都柏林,为了铭记二战这一创伤性事件,在这座城市中,到处分布着各式纪念碑、遗址和纪念馆。漫步于柏林的大街小巷,就像在一个庞大的二战纪念馆中游走,而整个城市的空气中,仿佛都弥散着德国人的忏悔之情。

作为美学形式的历史记忆,创伤叙事同样可以成为创伤性事件的有效载体。文学独有的生动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可以帮助创伤获得持久的、具有强大感染力和冲击力的声音,在这一方面,“见证文学”极具代表性,作者的切身体验在作品中可知可感,事件由此变得更为可信。在此类作品中,《安妮日记》最为大众熟知。二战期间,为躲避德军的搜捕,在长达25个月的时间里,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一座临河小楼中的一间秘密小屋,就是安妮全家人的藏身之所,而《安妮日记》则记载着这位德籍犹太女孩遇难前藏身于此的生活、情感和思考。逝者如斯,亲历者会陆续辞世,非亲历者则可以借助各种形式的叙事,探索悲剧性事件对个体或共同体的冲击。翻开文学史,不难发现,对女性的压迫、殖民剥削、世界大战、种族大屠杀和大饥荒等创伤性事件的文学书写从未停止,随着“记忆繁荣”热潮的兴起,一大批作家和作品开始聚焦于创伤,对此类话题的重视可谓前所未有:阿契贝、库切和卡利尔·菲利普斯等作品中的种族创伤,帕特·巴克和提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等作家笔下的战争创伤,托尼·莫里森和毕淑敏等作品中的女性创伤,本杰明·威尔科米尔斯基(Benjamin Wilkomirski)和安妮·迈克尔斯(Anne Michaels)等对“大屠杀”事件的关注,中国作家阎连科、刘心武和张贤亮等作品中关于文革创伤的回顾等。无论哪种类型的创伤,受害者往往是弱势或边缘群体。创伤性事件在产生心理影响的同时,还会影响到社会体制和关系的变革。重温创伤性事件,重写另类的历史和传统,将相关群体特有的情感、经验和声音周知天下,由此帮助无人代言的受害者找回记忆、声音和主体性。因此,对各种形式的“他者”而言,创伤叙事具有赋权之功用。

除纪念性建筑和创伤文学外,创伤性事件还可以借助于报纸、电台、电视、电影和网络等大众媒体升华为集体记忆,并在共同体中获得意义。在当下这一“记忆经由技术中介的新时代”(Meek

7),在创伤的表征和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体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前面论及的“9·11”事件中,正是以大众媒体为载体,类似于《坠落的人》(*The Falling Man*)^①和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之类的图像资料得以快速传播,从而使得这次恐怖袭击迅速演化为全球性公共事件。事后,同样是由于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各种相关的个体性创伤记忆才被不断推向公共领域,成为集体创伤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体创伤记忆由此被巩固和强化,但同样只有在集体创伤记忆中,个体性创伤记忆的意义才能凸显,不会在时间洪流中淹没。

接受、解读和回应创伤表征,同样是见证创伤的重要途径。而就创伤叙事而言,这是一种美学的见证,于连·沃尔夫莱就此指出说:“阅读是对文学传达的记忆的见证,面对非个人性的证词,读者必须进行回应,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Wolfreys 131)通过聆听、见证和在场,这些表征使得创伤性经历得以传播和共享,创伤由此成为共同的体验。当个体创伤在共同体中得到分享,就会演变为整个共同体的共同苦难,从而被社会中更多的人铭记。见证是经历创伤性事件并将其纳入个体性经验架构的方式,切身的体验可以帮助见证者更好地理解他者遭受的苦难,并做出伦理性回应,见证就是要“代替他者向他人言说”(Felman and Laub 3)。在讲述、阅读和见证创伤性事件的过程中,见证者被带回受害者所处的历史现场,见证者可以由此去接近、感知和体验各种苦难和不幸。需要强调的是,见证并非只是为了获取对事件的知情,然后尽释前嫌,把酒言欢,而是为了凝聚力量,激起反思,推动社会和文明的进步。因此,直面创伤性事件,剖析其“症状”,进行策略性解释、拆解和再现,目的是将曾经发生的不公、不合理,甚至罪恶公之于众,追溯悲剧性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激励见证者反思、反对和抨击各种不合理现象,由此给予“他者”更多关注。因此,表征、见证和回应创伤,是对历史、社会和时代的尊重和关切,也是伦理责任的重要表达,而共同体的修复、提升和完善是其终极目的。一言以蔽之,对创伤表征进行阅读和见证的意义不仅是要理解他者,还可以提供镜像,由此可以去反思自身和自身所在的共同体。

同其他记忆形式一样,创伤记忆并非是抽象的存在,并非对事件的稳固记录,而是牵涉到人为

的选择、建构和强化。需指出的是,经过适当解释,任何形式的创伤表征都可以演变为意义的宝藏。作为政治性力量,创伤记忆对民族、统治阶级和被征服的群体都有重要意义,不同群体都会致力于推出特定版本的“创伤记忆”,但只有那些以建设更公平、公正与和谐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秩序作为目标的版本,才应成为理论的终极追求。

结 论

总的来看,批评领域的“创伤转向”不仅是理论自身反思的结果,更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二战时的大屠杀、越战以及“9·11”等事件给很大范围的人群带去了伤害,心理治疗因此变得紧迫起来。此外,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更是让创伤成为不少人的日常体验,这一社会现实同样亟待批评理论去回应。在此背景下,不仅个体性创伤开始得到关注,集体创伤同样逐渐成为创伤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创伤以及创伤记忆同共同体的建构、维持和巩固间的紧密关系,作为建构性存在,集体创伤背后往往是各种权力的交织,其再现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权力可以把控文化创伤的建构,用于自身的目的,但不容忽略的是,对“他者”权利的争取,创伤表征同样可以成为倚靠性力量。在当下这一全球化时代,各种各样的“他者”仍无法完全摆脱被排斥、被剥削和被压制的命运,创伤始终是他(她)们日常体验中的重要部分。因此有必要跳脱此前狭隘的创伤概念,将殖民、女性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创伤都纳入进来。在对各种新形式的创伤的关注中,创伤研究的伦理维度得到凸显;当下的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重组和动荡,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伤害、苦难和生离死别,这给世界范围内的所有人都带去了伤害,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同样可以为建构更和谐、公正和美好的社会形态贡献力量。因此,在为理解文学提供视角的同时,创伤理论同样是文学批评回应历史、介入社会和重申现实相关性而结出的硕果。

注释[Notes]

① 关于现代社会变革带给个体生命的全新形式的创伤体验,可参见何卫华:“主体、结构性创伤与表征的伦理”,《外语教学》4(2018): 97—102。

② 此前,对遭受战争创伤影响的士兵,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些偏见,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可参见 Roger Luckhurst. *The Trauma Ques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49-59.

③ 在自己《沉默的经验》这本著作的一开始,凯西·卡鲁斯就专门论述了弗洛伊德提到的这个故事,并对从树干中传出的克洛琳达的哭喊声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在她看来,在这个故事中,“爱人的声音对他说话,在这一过程中,同样见证了他在无意中重复的过去”。详细论述可参见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0.

④ 关于这一概念的具体定义,可参见 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142.

⑤ 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论述,可参见何卫华:“《重生》:创伤叙事中的历史与伦理”,《当代外国文学》1(2018): 29-38。

⑥ 具体相关论述可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⑦ 这是在世贸中心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后拍摄的一张照片,拍摄者的名字为理查德·德鲁(Richard Drew),在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个人从刚刚遭到飞机撞击的大楼上掉了下来。在视觉上,这张照片极具冲击力,在当时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广为流传。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lexander, Jeffrey C..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Press, 2012.
- Antze, Paul, and Michael Lambek, eds.. *Tense Past: Cultural Essays in Trauma and Mem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Edkins, Jenny. *Trauma and the Memo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Felman, Shoshana, an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Forster, Greg. “Colonial Trauma, Utopian Carnality, Modernist Form: Toni Morrison’s *Beloved* and Arundhati Roy’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in Literary Trauma Theory*. Ed. Michelle Balaev.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70-105.
- Freud, Sigmun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61.
- Hartman, Geoffrey H. “Trauma within the Limits of Litera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7. 3 (2003): 257-74.
- 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 [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Trans. Shi Hongda and Chen Wenqi.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5.]
- Huyssen, Andreas. *Twilight Memories: Mar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Luckhurst, Roger. *The Trauma Ques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Martínez-Alfaro, María Jesús. “Fugal Repetition and the Re-enactments of Trauma: Holocaust Representation in Paul Celan’s *Death Fugue* and Cynthia Ozick’s *The Shawl*.” *Trauma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Narrative and Representation*. Eds. Marita Nadal and Mónica Calvo.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78-93.
- Meek, Allen. *Trauma and Med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Monteith, Sharon. *Pat Barker*. Devon: 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 Ltd., 2002.
- Visser, Irene. “Trauma Theory and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udies.”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47.3 (2011): 270-82.
- . “Trauma and Power in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udies.”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in Literary Trauma Theory*. Ed. Michelle Balaev.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06-29.
- Wolfe, Julian.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责任编辑:王嘉军)